

巴蜀道教 碑文集成

主 編 龍顯昭 黃海德

蔡東洲
副主編 查中林
楊 超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

主 編 龍顯昭 黃海德

副主編 蔡東洲 查中林
楊 超

四川大學出版社

1997.12

(川)新登字 014 號

書名	巴蜀道教碑文集成
主編	龍顯昭 黃海德
責任編輯	陸文璧
封面設計	村 夫
責任印制	張 凡
出版	四川大學出版社
印刷	成都白馬印刷廠
經銷	四川省新華書店
版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印次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19.125
插頁	4
字數	458 千字
印數	1—800 冊
書號	ISBN - 5614 - 1456 - 0/K·166
定價	48.00 元

蘇子龍

PDG

本書承

四川省教育委員會

四川師範學院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道學文化研究中心
(四川)中華文化基金會(籌)

資助出版

謹此致謝

四川師範學院
四川省社會科學院

合作科研項目

序

中華文化，肇自河源，始于昆侖，其地在川、青、甘河曲山原，其世則當原始社會母系部族農業興盛之時。昆侖鳥母部族即鳳族，以北斗七星定“四時八節”，約距今五、六千年。西王母又稱西王貊，“西王”爲其部族之姓，“母”者言其爲母姓，猶隋唐時“女國”之稱。當其時，昆侖系之神仙皆稱“西王”。夏商以還，如大禹養于舅家貊母，周穆王遠訪西貊，漢武帝直通西貊部，此皆取象七星，執天道以定人道，爲原始神巫之道，一脈相承也。黃帝之孫顓頊東遷于璠冢山，實乃陝、甘、川之大巫師。其承繼少昊金天氏白帝之酋王，兼鳥部聯盟神巫而爲鳥王。考諸史實，東夷崇拜太陽神鳥金烏，南越早有鳳朝陽之圖，禹像鳥喙，周崇鷄寶，蜀貢文翰，巴獻比翼鳥，皆淵源有自。近年考古發掘之三星堆文化，所見蜀王朝蠶叢、魚鳧、柏鸛、杜宇等，皆爲鳥文化之部族。當時巴、濮尚產犀、象，而群神銅像實有“萬象神宮”之輝煌。三星堆文化上承黃帝與顓頊，下開蜀開明氏王朝龍虎之邦，然其淵源仍是西王貊部族之鳳王鳥母。后漢畫像磚之西王母以龍虎爲座，斯亦鳥母掌握天時而統一炎黃之象征。昆侖三大部，黃帝姬姓在東北，炎帝姜姓在南方，西和月母（即貊母）之國在西部，此相互通婚之三恪即爲數千年華夏之核心。

開明氏蜀王朝(公元前 678 年至 329 年)延續數百年,后爲秦所滅。開明王族多改姓“李”(釐姓之狸),于是乃有后之“獠君”傳道法于張陵天師,稱正一道。

中華道教之祥嗣早啓明于古之昆侖,與六千年文明相稱并著。道德之教乃中華文化之本根,孔丘問禮于老聃,佛徒稱道于玄風,仁、仙、佛三教皆爲天人心宿之寶光,傳統文化之精華。

龍氏昆仲,宿學功深,早播名于中外,普學術于寰宇,通三教之定慧,爲開示之真師。兄諱顯明,爲吾同窗師兄,于佛學、敦煌學、文字、音韻、訓詁,靡不賅通。弟名顯昭,精通文史,學問博洽。蜀中二龍,誠不愧中華英杰,龍之傳人。

近年,顯昭邀集海德、東洲、楊超諸學人,合作搜輯自漢至清之道教碑文四百余通,博采精校,編成《巴蜀道教碑文集成》,大可補文獻之不足,爲巴蜀歷史之真傳。道教昆侖岷山丹法,真仙女冠之事行,宮觀道場之興廢,如是等等,大備于茲,功德無量,道史咸真。此繼往開來之史料,搜討匪易,不名于功夫,咸資于學人,真奠基之普賢,無名之勢至。黃冠、女冠、福冠必覽知道德深廣普惠記載,學者、智士、高隱因閱解華夏鳥母龍虎丹功。幸先流覽,殊頌成就,是恭爲序。學淺文晦,尚祈諒之。

中國道教文化研究所研究員
王家祐

一九九七年十一月九日
于四川省博物館

前 言

巴蜀道教在中國道教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值得人們去探索研究。這種地域性道教歷史文化研究的不斷深入，無疑會推動整體的道教歷史文化和傳統文化的深入研究。

巴蜀地區是我國道教發祥地之一。道教的形成大致在東漢后期。當時道教在全國有兩個中心，一個是東方的太平道，一個是西方的巫鬼道，即世所稱的五斗米道。西方巫鬼道活動區域主要在巴蜀一帶。如米巫張普活動于蜀區，張修活動于巴區，張魯活動先在蜀后在漢中。張魯祖父張陵，漢順帝時客蜀，學道鵠鳴山中（今四川大邑縣境）。陵死，子衡傳業布道于蜀地。後來奉其道者稱陵為天師，衡為嗣師，魯為系師，故五斗米道又有天師道之稱。張魯在漢中建立教區，實行政教合一統治垂三十年。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年），張魯降于曹操。曹操對道教實行利用和限制政策^①，把張魯及其道眾數以萬計地遷到三輔、洛陽和鄴城。其中徙鄴的一支最為重要，因為他們大多是五斗米道的上層，享有一定的政治待遇，具有較高的文化修養。曹操把他們集之于魏國（曹操的封國），既是為了防範，同時也便于籠絡利用。由于這裡原本是太平道活動的中心區域，故其結果則促成了東西方道教的合流。更因五斗米道文化上、政治上居于明顯的優勢，故融合的結果是五斗米道取代了太平道。自魏迄隋的三百多年里，無論南方或北方，道教面目基本上都是天師道了。

唐以前，巴蜀地區把道教推向了全國；入唐以后，道教的主流已由天師道讓位于茅山道，然而巴蜀道教確也有自己的特色。這

^① 拙著《論曹魏道教與西晉政局》（《世界宗教研究》1985年第1期）。

時，蜀中高道輩出，且學有造詣，多有著述。成都的至真觀是隋以來的一所著名道觀，也是唐初道教義學的講論中心。觀里有大殿講堂，觀主黎元興就在這裡主持講論。據《正統道藏》，黎元興有《海空經》十卷、《老子注義》四卷等。著名道士王玄覽亦隸籍至真觀，撰有《老經口訣》、《老子注》等。他在觀里主講道教奧理，有益州謝法師、彭州杜尊師、漢州李煉師及諸弟子聆聽，諮論妙義，詢問經教。他最具影響的著作是由其門人纂集而成的《玄珠錄》。與黎元興、王玄覽先后同時的，是聲譽京華的綿州道士李榮。他撰有《道德真經注》四卷，該書的理論水平足以使李榮成為與成玄英齊名的重玄學大家。此外，還有岷山道士張君相《三十家道德經集解》、眉山道士任太玄《老子注》等。唐末，著名道教學者杜光庭客蜀四十余年，著述宏富，所撰《道德真經廣聖義》五十卷，網羅漢晉以來詮疏箋注者六十余家；其中唐代的近三十家，總結了包括重玄學在內的各派學說，是集唐代老學之大成的名著。與杜光庭同師門的濠陽（今四川彭縣）道士強思齊，撰《道德真經玄德纂疏》二十卷。他獨具眼識，于《纂疏》中幾全錄了成玄英和李榮的《老子》疏注。成、李的疏注，宋以後若存若亡，今賴強思齊的《纂疏》乃得以窺其全豹^①。

唐末各地戰亂，巴蜀地區相對安定，而巴蜀道士重視道教理論的傳統一直沒有中斷，至北宋初，巴蜀又被視為全國崇尚道教的一個中心區域了。《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七十二、真宗大中祥符二年（1009年）云：“詔諸路、州、府、軍、監、關、縣擇官地建道觀，并以‘天慶’為額，民有願舍地備材創蓋者亦聽。先是，道教之行，時罕習尚，惟江西、劍南人素崇重。及是，天下始遍有道像矣。”在崇道風氣下，成都道士姚若谷、梓州道士朱知善欲盡讀道書，乃與其徒銳意搜求道教文獻，遍訪諸州，又至京師請賜官本道書，先后獲得

^① 蒙文通先生《古學甄微》第343頁〈校理《老子》成玄英疏叙錄〉。

六千余卷，并復制五套，分藏于成都、郫縣、青城山、梓州和綿州等五地道觀。象這樣大規模的、不由官府而由幾家宮觀聯合搜求道書，所得多至數千卷，最后達到資源共享共存，這種關心愛護文獻的精神是非常可貴的。這事發生在仁宗、英宗之際。后來金兵南侵，各地道藏多毀于兵火，而蜀地五處藏書無損，故于文獻保存上益顯其價值。南宋理宗時，果山（今四川南充市）道士範應元撰《道德經古本集注》，引證漢唐以來說解者約三十家，其中大多今已不存。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蜀中在保存和傳播道教文獻方面是富有成果的。

宋末元初，飽受戰火劫難的巴蜀地區，其道教遭到嚴重破壞，從此進入了長期衰落狀態。元初，受知于玄教嗣師吳全節的龍虎山道士汪集虛，于至正三十一年（1294年）來蜀，傳正一秘規，居青城四十余年，又于成都建正一宮，朝廷賜號玄昊真人、青城諸山正一宗主。但其后元亡，蜀中正一教亦不見有多大起色。

蜀中道教之真正興起，實始于清初全真教龍門派第十代傳人穆清風、陳清覺、張清夜等于康、雍間先后來川布道。他們在地方當局的支持下，以青城山、成都二仙庵、青羊宮為中心，開壇傳戒，廣收道徒。經過幾代輾轉相傳，枝柯蔓衍，弟子益衆，道徒散布兩川，其輻射區域內的主要宮觀祠廟多為龍門派道士住持。龍門派得以延續和發展，除其嚴守戒律，積極弘教等因素外，值得一提的是他們還善于經營管理廟產，保有獨立的經濟實力，為弘教活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如灌縣二王廟住持王來通道士、青城山常道觀監院彭椿仙（原名至國）道士等，即是其中的典型。他們于法事之外，植樹造林，栽桑養蠶，賑災濟困，助產興學。辛亥革命后不久，四川省省長楊庶堪特對彭椿仙道士通令嘉獎，賜“道在養生”匾額。

道教俗神梓潼文昌帝和川主二郎神的崇拜，都起源于蜀中。其中的梓潼神，唐宋統治者予以敕封，元仁宗更賜以“文昌司祿宏仁帝君”之號，這樣就把梓潼文昌帝君推向了全國。明清將其列入

祀典，在科舉盛行的風氣下，這位司文運之神的香火就更興旺了。文昌宮和川主廟在過去各府州縣以至鄉鎮，幾乎觸目皆是。象文昌、川主一類俗神，在川人中受到如此普遍信祀，可以說是宋元以來巴蜀道教的又一特色。

以上就是我們在編纂本書接觸碑文之后，所萌發的一些有關巴蜀道教特色及其歷史地位的粗淺看法。如書中所收《米巫祭酒張普題字》、《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啓大唐御立集聖山玄妙觀勝景碑》、《南竺觀記》、《崇道觀道藏記》、《成都路正一宮碑》、《碧洞真人墓碑》及《椿仙彭真人行道碑》，還有宋元以來的許多文昌宮碑和川主廟碑，都是直接記述巴蜀道教二千余年歷史的實物見證。

研究地域性道教史，《道藏》給我們提供了許多有用的資料。但是《道藏》編纂的角度不同，所收文獻自必受到某種限制，其局限性是顯而易見的。因此，研究地域性道教歷史，應當另辟蹊徑。錢大昕《關中金石記序》說：“金石之學，與經史相表里。”陳垣先生的《道家金石略》、《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即是運用金石文字研究道史的典範。因此，積極開發地方文獻資源，充分利用地方碑石文字材料，是開展研究工作的一個重要途徑。眾所周知，各地宮觀幾乎都立有碑石，這些碑石雖大多毀于兵燹，但碑文則保存于各種文集或總集里，有的收進了地方志，有的作為歷史遺迹存留至今。如果各省區都能把本地是類碑文輯出，結集成書，不特對研究地方道史，而且對全國道史的研究也提供了便利。基于這樣的認識，我們約集了一些志趣相合的學人，決定搜集并編纂一部反映巴蜀道教歷史的地方文獻，這就是《巴蜀道教碑文集成》一書醞釀的經過，也可以說是編纂本書所想達到的目的。

本書在着手之先，由我發凡起例，提出資料的搜求範圍、整理程序、編纂體例和編排方法，供大家討論。進行中的具體分工則是：由黃海德、蔡東洲協助我對碑文進行編輯整理，楊超、查中林負責碑文搜集、點校和寫出題記，黃海德、蔡東洲和研究生鄒紅美也

點校了部分碑文和寫題記，黃海德對部分遺存碑文進行了實地考察與校錄，譚官德、劉家定和汪海清參加了早期的資料整理工作。書末所附的兩種索引是由黃海德和研究生劉琴容、楊震編制的。最后由我負責通校通審，完成書稿的審定。可以說，這部書完全是集體合作的結晶。

本書所收各類碑銘總計四百五十七篇，是從浩繁的歷代文集、總集、地方志和其他有關文獻中搜討得來，尤其部分碑文是編者通過實地考察，據碑實錄，匯集成帙，殊感不易。如隋人辛德源《至真觀記》，清人嚴可均編的《全隋文》失收，陳垣《道家金石略》亦未錄。我們這裡是從宋人編的《成都文類》中輯出，並參考了幾種地方志，還從趙明誠《金石錄》中得到印證，知《至真觀記》是上了石的，因而碑文也是可靠的。現在展現在讀者面前的這四百多篇碑文，除少數是經前人和今人整理或標點過外，其余絕大多數都須從頭做起。在幾乎沒有參考借鑒的情況下從事這項工作，其難度是可以想見的；加之我們的知識有限，因此書中的闕失疏誤一定不少，切盼得到專家、讀者的指正。

最后，我們要感謝四川省教育委員會對本書給予的科研項目資助，感謝四川師範學院和四川省社會科學院道學文化研究中心、（四川）中華文化基金會（籌）的關心、支持和資助，感謝四川師範學院科研處的具體幫助。四川大學出版社陸文璧同志為本書的出版付出了巨大的心勞，在此也一并表示謝意。

著名道教學者王家佑先生非常關心本書的編纂工作，在即將出版問世時，復蒙其賜序，對此特向他表示衷心的敬意。

龍顯昭

于四川師範學院文化史研究所

一九九七年十月

凡 例

一、本書所收碑文，以關乎道教者爲準。凡涉道教之碑記、象記、塔記、幢記、洞記、閣樓記、宮觀記（銘）和墓志銘等，不限文體，均予收錄。少數文篇如鐘銘等雖非碑石，然有資考證，亦酌量收入。

二、碑文時限，上起后漢，下迄清末；少數民國碑，亦考量采錄。碑文屬地，略以古巴蜀地區爲範圍，一九九六年前四川省行政區所轄大部分市地與此範圍約略相當，入選碑文即以此爲限。

三、碑文搜集，漢碑依《隸釋》、《隸續》，唐以前及唐碑依《文苑英華》、《全唐文》，宋、元、明碑依《全宋文》、《宋代蜀文輯存》、《全蜀藝文志》，清及民國碑依地方志，并從歷代別集、總集、金石書、地方志及有關地方文獻中廣爲搜討，務求網羅較備。如碑石尚存，則實地查勘，訪碑錄文，使人選可據。

四、凡碑文有實物、拓本或著錄于多種文獻者，必廣求衆本，相互比勘，擇善而從。除時代較古、文字歧出較多者外，一般不出校記。

五、碑文年代，或依撰年，或依立石之年。碑文編排，以年代爲序。年代不能確定而朝代可確定者，則次于與之相當的朝代之末。年代約略可確定者，則次于與之相當的年代區間之內。

六、碑文原題有多名者，斟酌情況而取其一。因碑題名稱相同者較多，故于目錄中將撰人姓名置于相應碑題之后，以免相混。

七、一些碑的跋文、詩文及碑陰題名等，有助于閱讀正文、考碑證史者，亦酌量收入，附于該碑文之后。

八、每一碑文皆撰有簡要題記，說明碑文出處，撰人及撰寫年代（或刻石立碑年代），碑址及重要宮觀略歷。

九、爲便于檢索，書末附有碑目筆畫索引、撰人姓名索引。

目 錄

序	王家佑
前言	(1)
凡例	(1)
仙集留題(佚名)	(1)
米巫祭酒張普題字(佚名)	(1)
漢故領校巴郡太守樊府君碑(佚名)	(2)
至真觀記(辛德源)	(7)
仙雲觀大業造像題記(黃法噉)	(12)
仙雲觀武德造像題記(文口口)	(13)
辨法遷造像題記(辨法遷)	(13)
益州至真觀主黎君碑(盧照鄰)	(13)
慶林觀鐘銘(蒲真應)	(20)
南昌觀山龕碑銘并序(王八正)	(21)
青城山常道觀敕并表(唐玄宗)	(22)
青城山丈人祠廟碑(徐太亨)	(25)
啓大唐御立集聖山玄妙觀勝景碑(張庭訓)	(27)
南竺觀記(佚名)	(29)
龍鶴山成煉師植松柏碑(師 學)	(30)
龍多山仙臺題名(韋藏鋒)	(32)
三教道場文(李去泰)	(32)

敕果州女道士謝自然白日飛升書(唐德宗)·····	(34)
敕果州刺史手書(唐德宗)·····	(34)
棲鶴山碑(佚 名)·····	(35)
修仙都觀記(段文昌)·····	(35)
城隍廟記(段全緯)·····	(36)
梓州道興觀碑銘并序(李商隱)·····	(38)
道士胡君新井碣銘并序(李商隱)·····	(41)
南瀆大江廣源公廟記(李景讓)·····	(44)
西山觀咸通造像題記·····	(46)
封青城丈人山爲希夷公敕(唐僖宗)·····	(48)
改玄中觀爲青羊宮詔(唐僖宗)·····	(48)
西川青羊宮碑銘(樂朋龜)·····	(49)
龍多山記(孫 樵)·····	(63)
修青城山諸觀功德記(杜光庭)·····	(64)
劉真人記(張元濟)·····	(67)
寶圖山記(杜光庭)·····	(69)
焰陽洞記(杜光庭)·····	(70)
新修江瀆廟碑(蘇德祥)·····	(71)
金泉觀題詩并序(李 宏)·····	(73)
移建離堆山伏龍觀銘并序(馮 伉)·····	(74)
洞門亭子碑(魯 清)·····	(77)
修玉局觀記(彭 乘)·····	(77)
江瀆廟醮設廳記(馮 浩)·····	(81)
木樨觀序(蘇 洵)·····	(82)
題張仙畫像碑(蘇 洵)·····	(82)
益州增修龍祠記(田 況)·····	(83)

天慶觀五岳真君殿記(彭 乘)·····	(85)
道士袁惟正字行之序(文 同)·····	(87)
崇道觀道藏記(范 鎮)·····	(88)
集真觀記(呂 陶)·····	(90)
成都府學射山新修祠宇記(文 同)·····	(91)
成都府玉局觀新建五符幢記(文 同)·····	(92)
利州綿谷縣羊摸谷仙洞記(文 同)·····	(96)
榮梨山封敕碑(宋神宗)·····	(98)
鴻都觀題名(晁端輔等)·····	(99)
陽平鎮泰山府君三郎廟記(馮祖軻)·····	(100)
江瀆廟碑(胡宗愈)·····	(101)
石門山山王龕題記(佚 名)·····	(102)
陸道士墓志銘(蘇 軾)·····	(103)
仙雲觀題記(頓 起)·····	(104)
衆妙堂記(蘇 軾)·····	(104)
萬州虛鑒真人岑公贊并序(岑象求)·····	(105)
重修白鶴觀記(勾 軫)·····	(107)
龍洞觀記碑(楊 捐)·····	(108)
朱真人石洞記(鄒敦仁)·····	(109)
潼川府飛鳥縣三廟行祠記(杜 弼)·····	(110)
游龍多山詩碑(何 麒)·····	(110)
黃鹿真人傳(楊 續)·····	(111)
新繁古楠木記(蒲咸臨)·····	(113)
神女廟記(馬永卿)·····	(114)
石門山玉皇大帝龕題記(楊伯高)·····	(117)
東關縣建天祿觀記(杜寅生)·····	(118)

普成縣玉虛觀僧伽堂記(何朝隱)·····	(119)
洞真觀橫翠閣記(何朝隱)·····	(120)
玉皇大帝造像記(王 諒)·····	(121)
東岳大帝造像記(王 諒)·····	(122)
淑明皇后造像記(林口意)·····	(123)
學射山通真觀記(周 時)·····	(123)
游仙觀玉皇殿碑(楊百藥)·····	(124)
靈源觀馬明生記(閻蒼舒)·····	(125)
玉虛觀賜書記(郭 郊)·····	(126)
祈雨刻石(任 源)·····	(128)
重建龍潭宮碑記(蔡 濟)·····	(128)
真武聖像題記(佚 名)·····	(129)
李龍遷祠記(常百祥)·····	(130)
李神君碑(趙 溥)·····	(132)
藏丹洞記(陸 游)·····	(134)
趙彥博留題·····	(134)
金釜觀記(張見幾)·····	(135)
修東岳廟記(雍尚賓)·····	(136)
重修江瀆廟碑(陸 游)·····	(136)
會慶建福宮飛輪道藏記(王 惇)·····	(138)
靈泉縣安靜觀改作十方記(扈 輔)·····	(141)
龍多山至道觀記(趙 楙)·····	(142)
成都犀浦國寧觀古楠記(陸 游)·····	(144)
聖府洞紀行詩序(鄧 樾)·····	(145)
嚴仙觀記(楊師魯)·····	(145)
雲臺觀白鶴樓記(王惠明)·····	(147)